



远见卓识 切中时弊

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身为御史台中丞的卢怀慎,经过深入思考,果毅上疏建言,针对性极强地力陈对吏治改革的主张与见解,其核心内容有以下三点:

一是地方官员任职不满四年,不能提拔升迁。对于表现突出,政绩卓著者,可以采取加赐车马裘服、提高俸禄、派使节慰问、下诏书劝勉等办法予以褒奖,等到任职满四年之后,视官员空缺情况再考虑加以提拔重用。而对于德行有亏、能力不足、绩效极差甚至贪婪成性、暴虐百姓者,则要坚决果断地罢黜职务,令其回籍。

二是强调官员重在才干,而不是多多益善。要将朝廷各部门中那些为数众多的员外官一一进行甄别,确有才能可任事的,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外放到州郡担任地方官,对他们的政绩朝廷按期考核。对因老病不能胜任职务的,一律罢免。

三是因贪赃枉法、荼毒百姓而被停罢官职者,十年之内,不得加以录用,特别是不能放到执政基础较弱的边远地区,那是国家和百姓的灾难。

不可否认,卢怀慎吏治改革的三项主张,很有见地,堪称是一剂切中时弊、救世济时的良药。

厚德载物 甘当绿叶

《旧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开元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大意是说,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卢怀慎升任为黄门监,与中书令姚崇共同署理军政要务。卢怀慎自知为政之道不如姚崇,每遇大事都让姚崇决断。这样一来,时人就称他为陪人吃饭的宰相。

《旧唐书》中的这句话,竟让卢怀慎这位开元功臣与尸位素餐画上了等号。其实,他不仅不是不称职的庸才,还是一位不逊色于姚崇,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胜一筹的厚德宰相。

开元三年,卢怀慎与姚崇同掌枢密,二人一道严刑法、惩贪威、量才授官,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的重大决策,合作得十分和谐与默契。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倚仗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欺凌暴虐百姓,遭到御史弹劾后,被有司治罪。李业向皇帝求情,希望能够借助皇命免除王仙童所犯之罪。面对李业的苦苦哀求,玄宗皇帝下令中书门下进行复审。卢怀慎和中书令姚崇不因皇帝下诏而屈从,也不因王仙童为皇亲国戚而枉法,力主维持原议,依律治罪,遂联手奏道:“王仙童的罪状清楚明白,御史的弹劾并无冤枉之处,不能对他放纵宽宥。”二人的义正辞严令玄宗皇帝心服,于是就依原议结案,王仙童受到应有的惩处,皇亲国戚从此都收敛了嚣张气焰。

卢怀慎心胸开阔、格局远大,深知扬人之长、避己之短的道理。姚崇为人刚直,才于过人,办事干练,怀慎从内心敬服和敬重。现在二人同掌枢密,政见又契合一致,正是他积极配合姚崇放手施政的天赐良机。因此,卢怀慎心甘情愿做姚崇的协助者,随时补台而不拆台,辅助

卢怀慎



唐李嗣业画卢怀慎

卢怀慎,河南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唐朝宰相。他俭而守礼,进士及第后,以出色的表现和治绩,“累功”迁举,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御史台中丞、黄门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黄门监兼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他与名臣姚崇同期为相,二人携手为将唐朝推向辉煌巅峰作出卓越贡献。在此期间,卢怀慎直言敢谏,指陈得失,力主改革吏治,举贤荐能不遗余力,秉公执法坚如铁石,尤为可贵的是,他品德高尚、律己甚严、一生清慎、家风纯正,赢得朝野上下的普遍尊敬,哪怕多年过去,仍然令玄宗皇帝感动落泪。

到而不越位,与姚崇精诚携手,密切合作,为开元盛世的开启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卢怀慎为人宽厚,谦逊待人,开创了左右相合作共事的典范。玄宗皇帝对卢怀慎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甘做绿叶的崇高风范与躬身笃行的谦逊精神非常满意,对其给予了极高的嘉许,称他是一位“贞良敦朴,孝悌仁厚。度量深于江海,坚清迈于冰雪”的好官。

卢怀慎与姚崇为了执政大局,不计名利、密切配合的风范,一直延续到好几代后继者的身上。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亦如是言:“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唐三百余年之中。”这两位史学巨擘高度一致的中肯之论充分说明,卢怀慎为“开元之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大治之世的出现,除了君臣相得、开拓进取之外,还要有一个积极向上、和衷共济、和谐健康的政治风气。“开元盛世”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令人钦羡的政治风气,在我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在这风清气正、生机勃勃的大合唱中,谦让不争的卢怀慎声音虽然不够响亮,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显而易见,卢怀慎绝非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而是万世不朽的厚德贤相。

谦虚谨慎 清廉自守

卢怀慎虽然位极人臣,尊贵无比,但官德极佳。他一向谦虚谨慎,清廉为官,节俭朴素,扶弱济困,所得俸禄以及朝廷的赏赐,总是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帮助朋友亲戚,以致家徒四壁,妻子

一心为国 清慎厚德

马军

儿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在夫人崔氏的眼里,卢怀慎就是个一贫如洗的清正宰相,崔氏曾评价他:“清廉节俭,缓进而谦退,四方贿遗,毫发不留。”由于自身过硬,形象好,官声佳,影响大,他的下属官更多不忍坏其规矩和清誉,更不敢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了。

公元713年,卢怀慎与魏知古一同到东都洛阳主持选拔官吏,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可以骤然发财的肥缺。可是,卢怀慎随身的用具只有一个布袋,其中半袋圣贤之书,半袋赤胆忠心,去时如此,回时亦然。

卢怀慎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后,朝臣宋璟,卢从愿去他家中看望,但见他的“相府”已经不能用寒酸来形容,简直就是家徒四壁的贫民窟。炕上铺的是一张既旧且破的席子,潮湿的泛着泥土味的气息从席间弥漫开来,门上连一张帘子都没有。当时天雨骤至,冰冷的雨点在阵风的裹挟下,凶狠扑向室内的每个人。想不到,一个堂堂的盛世宰相,竟只能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撑起残破的炕席来遮挡风雨。天晚了,卢怀慎招待两位朝中贵客的“美食”,仍然是让人想不到,竟然只有两盆蒸菜、数根青菜而已,而这已经是他能够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卢怀慎去世之后,因平时不积钱财,家人给他办丧事遇到了很大困难。据说还是家中一个忠诚的老仆人自卖自身换钱才使其成殓,“既殁,家无留储,唯苍头白鬻,以给丧事”。朝野闻之,无不唏嘘感叹,四门博士张星就向玄宗皇帝进言说,已故宰相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世,对这样的好宰相应该给予优厚的赏赐,否则就不能劝导其他官员以他为榜样,竭忠尽智报效国家。于是玄宗皇帝下诏赏赐卢家织布百段,米粟二百石。

卢怀慎的清慎,征服了包括玄宗皇帝在内的很多人。一次,玄宗皇帝在卢怀慎老家附近打猎,无意间看到他家低矮的围墙已破败不堪,当得知卢怀慎去世已经两周年,此时他正在

为卢怀慎举办祭祀典礼时,玄宗皇帝立即停止打猎,并给卢家赏赐了一些细绢帛,以弥补他们过于简朴的祭祀。当玄宗皇帝策马经过卢怀慎的坟墓时,见其与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甚至连墓碑都还没立,他不由得想起卢怀慎正直清贫的一生以及对盛世天下国泰民安的巨大贡献,遂泪如雨下。于是敕命为他立碑,并令中书侍郎苏頔草拟碑文,玄宗皇帝亲自书写。

鞠躬尽瘁 举贤荐能

卢怀慎一心为国,即使在重病之中,心心念念的仍是朝政的安定和国家的未来。他久久握着宋璟,卢从愿二人的手叮嘱说:“当今圣上英明,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他在位日久,难免对政事稍有倦怠,恐怕要有险恶小人乘机钻空子。你们经常在天子身边,一定要密切关注天子的举动,以免朝纲混乱!”临终之际,卢怀慎遣表力荐胆识兼备、浩然正气的宋璟,坚贞耿介的李杰,铁面无私、刚毅果决的李朝隐以及清廉谨慎、毁誉不计的卢从愿等四位贤良之臣。其心至诚,其情至切,杜鹃啼血,催人泪下:

“宋璟秉性公平正直,办事执着。他的文学才能足以经纶政务,他的见识谋略可以辅佐时政。他的行为历来正直,从不苟合。臣听到朝野对他的评价,实在是社稷之臣。李杰无比勤奋刻苦,特立独行,从不依附权势;有利国家的事情,他知无不为。他也是一时难得的人才,得到舆论的推许。李朝隐操履坚贞,才识通晓,奉公守法,颇怀铁石之心。他事奉陛下竭诚尽心,的确到了人臣的节操。卢从愿清慎谨慎,思考问题和处理政事都非常周密。他的始终如一,朝野共知。像这样的简要之才,不可多得。他们都是盛世重器,圣代良臣。近来他们在自己任上,稍微有些过失;他们受指责的事情很小,然而朝廷对他们的遗弃却

刘文嘉的菊花情怀

郑言

刘文嘉,字任甫,湖北省嘉鱼县陆溪镇人。他早年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袁世凯称帝及军阀混战的时候,因生性耿直两度辞官。1929年,刘文嘉经友人介绍在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东铁路督办公署任职,生活稳定优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嘉不甘当亡国奴,举家迁来北平,以退职金购得城北南海净业湖畔住房一处,连同园地约6亩,取名“契园”。在日伪盘踞时,为避免日军胁迫和汉奸纠缠,他蓄须隐居,种菊自娱,自号“契园老人”,取“洁身自好,闭门谢客”之意。他多方收集各地名种,推陈出新,菊花艺菊,成为有名的园艺家,人送雅号“菊花刘”,一时驰名京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帮助,设备扩充,人员增加,培育技术提高,契园菊花品种达到1000多种,栽花1700盆。人们纷纷慕名而来,观赏菊花。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和外宾也时常前来赏菊,契园菊展远近闻名。

自1951年起,毛泽东曾三次来契园赏菊,并安排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有一次毛泽东来契园赏菊后准备离去时,契园大门已被群众拥塞。工作人员请示毛泽东是否从后门离开,但是毛泽东认为没必要,仍从前门而出。当毛泽东刚一出现在大门时,周围群众欢呼雀跃,震声街巷,并主动让出一条通道,仁立致敬。毛泽东走在群众中间,频频挥手,含笑示意,然后乘车离去。刘文嘉感慨丛生,赋诗寄怀:“共襄神州首座尊,四年三顾任高标。书生久守田园拙,寿客新沾雨露恩。宝墨留香文字重,谦光握手语言温。人民爱戴空前古,拍手欢呼拥辇门。”

1955年11月20日,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来到契园观菊,二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盛开各种名菊,并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周恩来还挥毫题写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八个大字,笔力雄浑,姿态潇洒。

朱德从1949年至1961年,几乎每年都来契园赏菊。1955年11月26日,朱德在观看菊展后,题诗曰:“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且盼和平同处日,愿将菊酒解前仇。”描写了菊花冰清玉洁的品性,也是一语双关称赞刘文嘉的民族气节,同时寓志于诗,表达了期望祖国统一的心情。1961年,刘文嘉艺菊30周年纪念,11月3日,朱德前来观展祝贺,并赠送自己种养的两盆秋兰,挥笔赋诗:“刘老契园助国光,卅年种菊永留香。精研善养奇葩好,承启启新世泽长。全力栽培传代久,不辞辛苦为人忙。京都老少欣来赏,敬赠幽兰配北堂。”刘文嘉异常感激,依原韵和之:“首都花放好秋光,篱下新添异国香。共仰元戎功业峻,独培幽客道心长。闲来纵笔吟诗美,老去投戈讲艺忙。雅睨拜嘉如拱壁,含芳吐馥满寒堂。”

1953年11月3日,董必武偕夫人到契园赏菊,被争奇斗艳的菊花所感染,题联赠予刘文嘉:“习劳自种千盆菊,爱客同看百日花。”赞扬契园主人勤劳的品格和艺菊技巧的高超,以及与众同乐、与人共赏的高雅人品与旷达风格。刘文嘉感激之余,赋诗奉酬:“同舟鄂渚忆前身,转眼韶光四十春。愧我锄园空学律,欣公奉国共司纶。书联不让香光美,爱菊何殊靖节真。所冀和平瞻造化,余生等作葛天民。”

1960年,76岁的刘文嘉深感身体衰弱,精力不济,唯恐菊花品种及栽培技艺在他手里丢失了,就将契园无偿捐献给国家,为继续研究培植花卉使用,自己退居二线,担任技术指导。接受捐赠的北京园林处将契园及菊花品种委托给北海公园管理。北海公园成立专职培育菊花的菊花班,将刘文嘉的艺菊技术一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如今,北海菊展已驰名遐迩,在北京乃至全国菊界均占有一席之地。每届秋节之际,北海菊花山花海,秋色遍染,秋韵盎然。八方游客乘兴而来,品玩鉴赏,与菊同乐。

“尸位素餐”的“尸”不是指尸体

许晖

“尸位素餐”是一个常用的成语,形容空占着职位,空食着俸禄,却什么事也不做。很多人都把“尸位”理解成尸体所占的位置,这是错误的。在古代,“尸”是非常重要的祭祀礼仪。

《说文解字》:“尸,陈也,像卧之形。”这个“尸”的本义可绝对不是尸体,而是“陈也”。尸体之“尸”则必须写作“屍”。什么叫“陈”?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解道:“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原来,“尸”的本义是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

据《礼记·曾子问》载,曾子曾经询问孔子:“祭必有尸乎?”孔子回答道:“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古人认为祭祀的目的在在于和祖先的灵魂沟通,用孙子来代表死去的先祖受祭,可以凝聚先祖之气,这种祭祀称作“尸祭”。

唐代学者颜师古在为《汉书·朱云传》所作的注中说:“尸位者,不举其事,但主其位而已。”代表先祖受祭的子孙,在祭祀时仅仅是先祖的替身,是先祖灵魂的附体,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做,只需要坐在神位上,“但主其位而已”。如果把“尸位”理解成尸体所占的位置,人死不能复活,怎么还能空占着职位呢?

“尸位”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大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夏朝君主大康空占着国君的位置,却只知道享乐,于是百姓都背叛了他。“素餐”一词出自《诗经》中魏国的民歌《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是空的意思。清人陈奂在《毛诗传疏》中解释得最为明白:“今俗以徒食为白餐。餐,犹食也。赵岐注《孟子·尽心篇》云:‘无功而食,谓之素餐。’”有人把“素餐”误解为素食,这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解释是“无功而食”,即颜师古所说:“素餐者,德不称官,空当食禄。”

汉代人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用来比喻居位食禄而不尽职,比如《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语词精奥

宋代名臣司马光一生珍视诚信,其胸襟光明磊落、为人直率坦荡,无论是为官、治学还是处世,始终秉持诚信之道。司马光认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他曾自我评价:“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正因为这样,在历史上司马光曾与孔子、孟子一起,被奉为儒家三圣。《宋史》评价司马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诚心自然,天下敬信”,清人陈宏谋也赞誉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

司马光笃奉诚信,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有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据宋人邵伯温的《闻见录》记载,司马光五岁那年,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他和姐姐想吃,却剥不开皮。姐姐有事走后,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不一会姐姐回来了,问他是谁想出的办法,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事情的经过正好被司马光的父亲看到,他厉声斥责了司马光。严厉的批评让幼年的司马光记忆深刻,“光自是不敢慢语”。

司马光家中有一匹良马,其性情温顺、毛色纯正、高大有力,但是每到夏天会患肺病。司马光在生活中非常俭朴,时常拮据,为补贴家用,司马光不得不忍痛割爱,让仆人将马牵到集市上卖掉。司马光一再叮嘱仆人,卖马时要将马有肺病这件事告诉买家。仆人说:“马患肺病别人从外表又看不出来,为什么要主动告诉买家呢?若提前说了,怎能卖得好价钱?”司马光正色道:“卖马事小,诚信事大,岂能因贪利而损名?”于是仆人照实卖马,集市上的人都赞扬司马光为人诚实。

不仅在生活中,在朝堂政事上,司马光也是奉诚信为宝,公私分明,不计恩怨,也从回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之间的交往,或许更能体现他的诚与信。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也都是正面辩论。私底下,二人相互敬重,从不诋毁对方。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来,司马光深为悲感。他担心王安石可能会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诋毁,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宋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应庞籍的征召,出任并州通判。在他受庞籍的派遣考察麟州屈野河以西筑堡一事时,司马光上报修筑堡垒

司马光的诚与信

王厚明

可以保护边界安宁,不料筑堡的官兵千余人大部被西夏军围歼。御史来查案时,司马光已接到回朝任判吏部南曹的命令,庞籍为了让司马光能够回朝上任,便一人承担下责任,这使得司马光心怀愧疚,自责不已。他接连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以主动担责,要求处分,但两状均无批复,司马光只好在上朝时向朝臣们逐个解释,“言之切,口几流血”。最后,司马光还直接只身前往中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执政大臣的答复是:御史未给你定罪,何言降谪?这让司马光寝食不安、夜不能寐,常猛拍床板以痛悔。

对于人人皆向往的高官厚禄,司马光也是实事求是,不违心趋附。对于适合自己并能够胜任的职务,他毫无保留尽忠职守;反之,对于不胜其任的职位,即使官阶再高、俸禄再多,司马光也决不接受。

嘉祐三年(1058),有宦官来司马光府上宣布敕令,擢升司马光为首都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司马光却认为自己“实非所长”,并写下《乞就州州状》,请求辞去开封府推官这一人人艳羡的高职。皇上御批四字:“不许辞免。”司马光接着又写了第二状、第三状,但都被驳回。为缓解内心的愧疚,他特地请假回乡扫墓。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升为知制誥,但司马光不愿就,他认为这一差事并非他之所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三月连上九次《辞知制誥状》,说明自己不宜任此职务。

司马光晚年时,正值哲宗年幼,皇太后想授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但他却辞谢道:“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苏轼这样评价司马光:“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在司马光的老家陕州及其著书十多年的洛阳一带,如果谁做了坏事,人们就会批评他:“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这可谓历史对司马光诚信的真实评价与褒奖。